

书趣

张伯昭

上大学的五年和参加工作的头三年是我热衷于买书的时期。

这或许受校风的影响，那时候的中医学院，80%的男生共同爱好是买书。体现在书的数目上，三、四百本是平均数，多的有两三千本，可惜的是毕业分配工作时男生的灵活性和执著都远远不及女生，大多数外地男同学都乖乖地回了家乡，所以这许多“尾大不掉”的多日积藏便让同学们在行李箱之外，或多或少地有了几口书箱之累。记得是我毕业后的第二年吧，中医学院宿舍楼失火，而且烧的最惨的几间是快毕业的那个班级的，我听到后颇为惋惜，知道一定损失了不少图书，虽然我确定其中并无秦始皇焚书时遗留下的善本。

那时还是穷学生的我们买书无非有这么几个渠道：到新华书店或者其他医学专业书店（如人民卫生出版社或中医古籍出版社的门市等）买新书；到每年定期举办的降价书市买折价书；到旧书店买便宜的旧书；从即将毕业的学长那里买些他们淘汰下来的书；还有时候、若是运气好的话，可以从因为交女朋友而发生经济危机的同学手上买到不少物美价廉的“珍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这场交易中占到了便宜，但有“骨气”的买主绝不会因此而得便宜卖乖，相反，那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卖主一时间往往成了大家打趣的对象——在我们看来，他们与拿了传家宝去换饭吃的末路的八旗子弟差不多）。

无论怎么说，新书无疑是太贵了，除了迫不得以的急需之外，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买新书的打算一拖再拖，因为谁心中都希望在某天在某个旧书店能买到那本心仪已久的书的旧版！快毕业时，外地同学们眼看在北京的日子已经无多，而外地是少有北京这样多的书店的，这时他们才往往痛下决心，昂然走进书店、从早已熟悉的位置上取下那本已经翻过多次的尤物、潇洒地走向款台、排出几张人民币……而我们这些可以继续在北京的人呢，则继续做着原来的梦。

自元明清以降，北京作为帝都已数百载，其文化气氛之浓厚，恐是全国其他城市所难以企及的。书店多，旧书店也不少，便是文化氛围的体现之一。说北京的旧书店多如牛毛，确有些言过其实，但算起来那时总有七八十家吧。北京大多数的旧书店都挂着同一块招牌——中国书店，名字很怪，究其缘由，可能是几十年前政府将多家私营书店收归国有，而这些书店联合之后便公议出此名称，该推测是否正确，留待智者评之。我曾有幸购得一本夹有一张60年代初购书发票的中医古籍，开发票的书店就是在隆福寺街上的一家中国书店，而那时还叫“××斋”。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还是琉璃厂，大概有十几家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作家鲁迅在寓居北京的数年中，便是琉璃厂的常客，他在这里购书买帖、收集秦砖汉瓦……《鲁迅日记》中常有如下记载：从教育部（当时在六部口）出来，穿过杨梅竹大街和一尺斜街（当时南新华街和和平门大街还没有开辟），便到了琉璃厂……名依旧而人已非，所以每当我经过这些地方，总不禁发一阵怀古之幽思。

琉璃厂里有个“海王村”书店，因其地曾出土过一块刻有“海王村”地名的金代石碑，碑上面说该地在金中都城东北数里，据此考古学家断定金中都应位于现在北京宣武区莲花池周围，该典故一时间传为佳话，书店也因此得名。话说这个“海王村”书店名字叫得虽响，但其入口却设在另一个专买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的商店的一个角落里，不知就里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书店狭长，里面少有窗户，即使是白天也需开灯，店里书客寥寥，在日光灯的嗡嗡声里，年轻的店员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谈笑，而那些忠于职守的老师傅们则坐在角落里日复一日地做着修补裱褙等繁琐工作。我则徜徉于书海间，忽而政经、忽而史地、忽而中医地猛转一通，择其物美价廉者而购之。我购书的范围极广，中西医学、政治法律、天文地理、历史科技，只要是我认为能拓展自己知识面且价格又能接受的，无所不购。中西医学之外，我最喜爱的是历史和文化掌故方面的书籍，对此领域的知识我十分感兴趣，即使时至今日，我对中外历史上许多事件仍能如数家珍般地侃侃而谈，并颇引以为自得。

大概为价值规律所左右，旧书店图书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90年代以前，旧书的价格是绝对低于原价的，由于原价往往是60、70年代所定的，不过几毛、几元，所以这时的旧书非常便宜；但9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了，先是旧书价格逐渐接近原价，不久之后便超越之，开始店员们在改动价格之前还先刮去旧价，后来索性连这道工序也省略了，大概先还是有些“做贼心虚”，随后便十分心安理得了。其实也难怪这些店家，当时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旧书店要生存、也要赢利！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对大学生每月有17.5元的副食补贴，用这些钱能买到一大摞旧书；可后来，补贴涨到40余元，而书却买不到三、四本了，由此可见一斑。我父母只是普通的技术工作者，既非官僚，又非商贾，所以我买书的款项需要自己筹措，节省零用钱，加之副食补贴，再加之每年80元的奖学金（我虽然努力学习，但也仅保在班里男生中尚可拔得头筹，若比之那些刻苦攻书的女同学，则难望其项背，所以连续数年拿的只是乙等奖学金），对这些血汗钱我怎能不精打细算呢，往事不堪回首呀！

那时的每个星期，课余必定要去转转书店，否则会觉得很失落；到了假期，时间更多了，于是订个计划，把众多的书店按坐落的位置分成几组，每组书店基本在一条线上，尽量避免跑冤枉路。每天清晨骑车从家出发，去逛其中的一组书店，中午前后则可饥肠辘辘地赶回来，第二天再换另一组，下个星期又周而复始地再转一遍。连续数个假期，如此不辍，虽然辛苦，所获却颇丰。记得有一次在琉璃厂发现了一套80年代初中华书局版的《史记》，共5册，印刷精美，价仅十元，而当时版本相同、但稍后印刷的《史记》价格却要三、四十元，不禁大喜，立即抱于怀中，奔至收款台，店员见之亦大惊，忙跑回书橱查看，遂又释然曰：我留的5元的那套的还在。当时心情几起几落，想店员收拾存货，自然有捷足先登之便利，原本无可厚非，但若按书店的行规，售者自己是不可以留书的，可在这人心不古的社会里，行规只不过是句空话罢了！还记得那天下午2点才回到家，甫进家门，天空雷雨大至，凉风自南，溽暑为之一消，此刻展卷读此“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劳顿饥渴全无，其喜洋洋者矣！

工作之后，收入渐多，然闲暇时间渐少，往往只能利用下夜班后的空闲去转书店。因我供职的医院在城西南，而家在城东北，每天都要穿城而过，故归途中去转转亦不绕远。再以后，工作日忙而购书兴趣日减，若有所需，不过是捧去书来，不复有往昔逐行逐架翻检旧书的兴趣了！

购书之后，我还有个习惯：在书的扉页或底页的空白处记下购书的时间、地点和一小段话，这一小段话可能是书评，如“该书慕之久矣”，或“必将大有用于时”等，也可能是购书的经过，如“是日大暑，气温40度，挥汗如雨，然转书店不辍，故得此”。以后再翻阅时常常有感再发，补记于后，这样下来一本书上往往有数段小文，展卷忆昔，每每畅发幽思，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的大学时代。

经过多年积累，我的藏书也达到了近两千册，虽不能充栋，但若搬运起来却足以汗牛，遂自号曰“半屋书房”，还曾自刻闲章一枚，曰“半屋主人”，往往印于所藏佳品之上。此次移民来纽，远涉重洋，寄居异国，故除中西医学之外的图书一概未携。即便如此，出发前我仍须对医学书籍遴选再三，有些书不忍割舍却不得不弃置国内，如此痛苦之时不由得想起李煜《破阵子》中的那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后记：来纽将近一年半，生活初定。有时记忆就如同不经意间打开了的一口旧衣箱，往日旧事象一件件的衣服重又新鲜出炉，便将这些回忆一鳞半爪地记录下来，与大家共赏之。